

清前历史与 盛京文化

清前史研究中心成立暨
纪念盛京定名300周年学术研讨会

白文煜 / 主编

【下卷】



辽宁民族出版社

清前历史与 盛京文化

清前史研究中心成立暨
纪念盛京定名380周年学术研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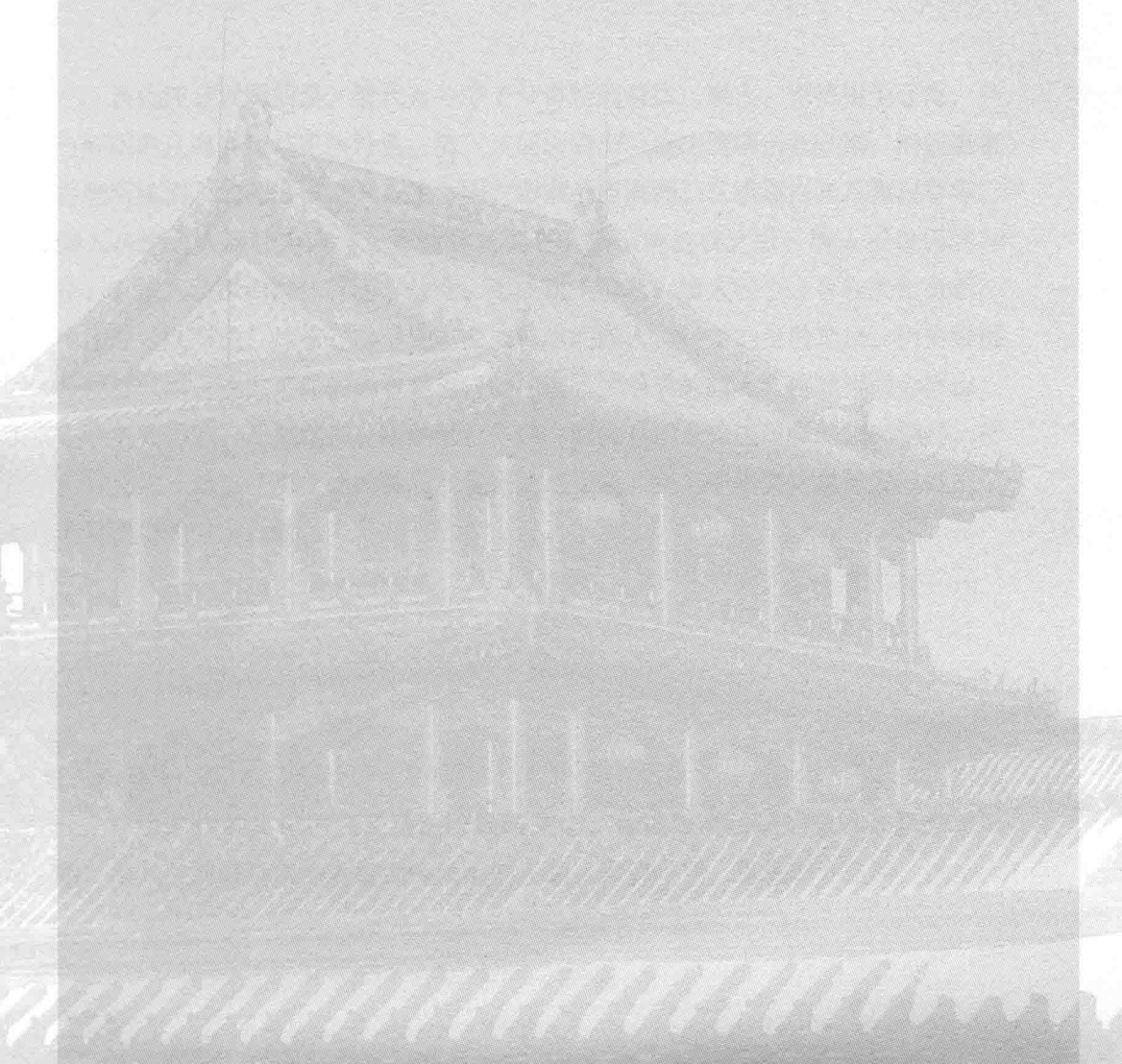
【下卷】

白文煜 / 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第三部分】

盛京史地与文化



从清初旗人文化成就看盛京文化的特殊贡献

张玉兴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清代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群体：旗人。它植根于辽海，具有鲜明的辽海地域与民族特色。清入关前即满洲崛起的清朝创业时期，清统治者曾把所统治下的民众皆纳入八旗之中，所谓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及八旗汉军等，编入八旗之人通称为旗人。当清兵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之后，旗人不仅仍然存在，且成为特殊的群体存在于社会，形成旗人群落、旗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由辽海地区形成，具有辽海地域与民族背景的旗人，特殊的身份地位、历史经历及精神气质，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清入关前后的旗人文化建树颇为突出，它的务实态度、开拓精神、吸纳融合作风、群体意识及独领风骚的创新精神，把盛京文化，乃至辽海文化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更为中华文化总体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杰出贡献。

一个时代的文化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思想与风貌。清入关前最高统治者皇太极统治的天聪、崇德时期，思想颇为活跃。这是因



为，皇太极求治心切，紧扣时代脉搏，因时而进，高瞻远瞩，寻求治国之方，乃放手臣下各抒己见。于是臣下敞开心扉，积极献计献策。竟而出现创造辉煌，展示辉煌的奇迹。此时遵命进言者主要有两部分人员，一是文武官员，即众贝勒大臣，一是文馆诸文臣与文士。众贝勒大臣多是从既得利益出发，坚持狭隘的守旧立场，一片肆行杀戮抢掠的呼声，此且不论；而诸文士则有与之迥然不同的高远见解与主张，极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这时文馆的诸多文士，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文化底蕴，但却被掠入旗下为奴的劫后子遗者，他们皆有复杂悲惨的入旗经历，已成惊弓之鸟。然而他们毕竟又是融入八旗社会的旗人，他们历经波折的生活道路，已紧紧地与八旗的兴衰连在一起。历史的际遇往往出人意外，特殊的政策感召，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当皇太极向他们发出坦言治国见解时，这些曾失去人身自由与尊严而苟延残喘的枯木朽株，突然有受宠若惊之感，被压抑的思想为之一振，皆针对现实，殚精竭虑，积极如风激泉涌般地畅抒所见，各展宏猷，献计献策以振兴国家。于是，后金社会出现了诸文士意气风发，竞相进言的壮观景象。皇太极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奇效。

后金天聪年间旗人留给世人一部很有价值的言论集：《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这是诸多旗人谋士，主要是文馆文士应皇太极的要求就后金建国方略、治国方针、各种举措进行大讨论时，畅所欲言的汇集。这些言论以通俗畅晓的语言，针对现实，议论横生，观点新颖，有的放矢，多有灼见。诸文士思路敏捷，倾心建言献策，阐述政治主张。襄助皇太极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早期满族国家的封建化。其主要建树有：

1. **明确提出改革方针。**当年主张改革者大有人在，如提出“达变通权，事无不思”，要“改先汗之故习”¹，等等。但明确提出改革的方针者则是宁完我，他可谓是此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要“参汉酌金”“渐就中国之制”。即根据后金实际情况参考明朝的典章制度加以变通，以逐渐与内地接轨。当年，皇太极改革心切，后金的一切举措，皆仿照大明会典。宁完我上奏指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明朝的典章制度确实最为完备，如大明会典虽是好书，值得仿效，但我们今日不能全部照搬，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加以变通，以完善后

¹ 胡贡明：《陈言图报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9，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金体制。他说“必如此，庶日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至手忙脚乱”²。

2. 明确提出以儒家经典作为政治改革的理论指导。王文奎上奏建议“勤学问以迪君心”。他感叹说，臣“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又说“汗尝喜阅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其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写，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汗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³。这是要用儒家思想武装头脑。宁完我上奏指出四书武经通鉴等典籍，是修身治国、聪明益智、通晓兴废之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应加选择翻译，“不时呈进，汗宜静览深思”⁴。

3. 主张进行官制改革。当时后金已于天聪五年设立了六部，并各有长官及主管贝勒。就此，马光远提出六部要设总裁、设六科。他认为：“六部设而总裁无人，未免各是其事”，“六部既设，总裁无人，即如车无轭，船无舵，凭何主持”？因此建议：“乞皇上早选清正练达二三臣立为总裁，于皇上大门迤里。盖建内阁三间，令各总裁每日黎明入阁”办事，“则圣虑不繁，国政不乱矣”。所谓“总裁”实即宰辅、大学士之类。他又认为“六部既设，不设六科，是衣无领袖也，耳目之寄，上下之情，赖何通达”？所以建议“皇上早选公直勤慎之人，立为六科，经理六部之事。凡有上传下奏事情，各照各科回奏，不许互相推诿，不许参差泄露。如此则国政分明，诸事不至壅滞矣”。他又建议设立“八道言官，不时访察”。这是主张设立六科给事中、御史之类的监察机构，以保障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行。刘学成则建议设立下情上达的机构通政司，他说：“要视朝，勤政体，恤民情”，“须像汉朝，设立通政司一员”，当百姓有所申诉“随即上奏”⁵。

4. 辨服制，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等级秩序。李栖凤强调指出衣冠制度

² 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71，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³ 王文奎：《条陈时宜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21，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⁴ 宁完我：《请译四书武经通鉴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62~63，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⁵ 刘学成：《请设立坛郊社及通政司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87，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的重要性，必须建立。他说：“衣冠上下，千古不废”，众臣奏章中虽然每每言及，但未见允行。遂谆谆而言道：“然一代之君，各有一代制度，我汗另立一番，惟分别尊卑等级，便是制度，何其固执不行耶？国体威严系于斯，人心系恋于斯，纪纲法度系于斯，风移俗易系于斯。我汗奋然一行，许多便益，所当速图者也。”⁶王舜提出“别冠服以肃国体”的主张。他认为“自古冠服之区别，贵贱尊卑系之”，“帝王之冠服，不同公侯，公侯之冠服，不同散官，若是庶民，即家资巨万，不过庶民之冠服已而。惟有功于国者，衣冠不等平人，所以礼不容毫发僭越。故创业帝王必首辨冠服，严等威”。而实际上的情况是“今我国冠服混淆，贵贱难分，甚有乐户之穿戴更强于良贵，所以人重富不重贵，而汗大体失矣”，故“当急宜分别冠服”⁷。

5. 荐举人才，培养安邦治国、守土治民的文臣诸项。治国强邦唯在得人，文馆诸臣一再上奏建议，要争取人心，广收人才。王文奎指出：“古来成事业者，要求实用，不贵虚名，而欲求实用以图事功者，尤必以得人为第一。”⁸姜新指出“修德行仁，延揽豪杰，收拾人心，为今日第一勾当”⁹。他们更提出要诚心实意地爱惜人才、使用人才，唯如此，人才必竭其力。胡贡明建议说：“自古豪杰相遇，就若平生相遇过的一般。任人者，开心见诚；任事者，尽忠竭节，做什么事便成得快。”“人之可用不可用，不在于人，惟在皇上之能用不能用也。”¹⁰王舜更如激将般地尖锐指出：“皇上不兴养贤之典，或者道无豪杰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一大后金，岂无扶王定伯之才乎？只要皇上提拔真才，特典养活一人，真正豪杰，互相弹冠而乐为皇上用，而皇上得收养人之实效矣。”他还进一步指出使用人才要有长远的战略计划，他说：“世不绝圣，国不乏贤。我国之小榜什，老成持重者虽少，而聪明伶俐者亦多，汗当尽搜国中识汉字者，置之书房，出入禁庭，朝夕讲论。如此激励，二三年间必有成才者，今日

⁶ 李栖凤：《尽进忠言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25，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⁷ 王舜：《恭陈末议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26~27，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⁸ 王文奎：《荐举人才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68，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⁹ 姜新：《请早决西征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4，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¹⁰ 胡贡明：《陈言图报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10~11，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之小榜什，可谓后日之大榜什矣。”¹¹王文奎则指出“顷闻开科取士之议，诚开创急著”，“然则开科固今日之急务，而实非论才之完策也。为今日计，汗宜恳切出一明谕，不拘俗类，不限贵贱，不分新旧，令有才能者不妨自荐，有熟知者，许令保举”。如此，“则为力易而收效多”¹²。他们更具体提出遴选人才的办法。胡贡提出“举孝廉，乃汉朝之美政，不举孝廉，则人不学好，纵有才学，为政必乖。伏乞皇上并法行之。一则可为我国取材济世之明制；二则可以昭我万世不休之盛事也”¹³。

6. 建议设立官学，加强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胡贡明提出：“皇上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诚大有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书极好的事，反看作极苦的事，多有不愿的。”“以臣之见，当于八家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并建议选好师傅，“查其德行可为弟子样子的，置教官学”。“小者教其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则教其子、臣、弟、友、礼、义、廉、耻之道。诱掖奖劝，日渐月磨，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理，郁郁乎文物之邦矣。”¹⁴这更是要以儒学教化社会，启迪人心。

7. 做事要认准方向，即应当机立断，出师无名，事故不成。此外，还有谆谆告诫，建议只要认准方向，事情可行，即应当机立断，不可犹豫。高鸿中说：“帝王事业不患其不能成，只恐其不肯做。”¹⁵张弘谟等说：“尝观自古大有为之君，未有不顺天因时而能成事者，未有违天时而反受其咎者。”¹⁶胡贡明说：“自古好事必因时而成，所以无难做之事，只有难得之时。且事每成于果决，多败于犹豫，故时当做事，则当果决做之，必不可犹豫以失之。”¹⁷

当然，诸多建言中也有指陈时弊，直言不讳地对后金社会诸多乖谬之事提出批评。他们特别反对八旗军事活动中的肆行烧杀劫掠。当年劫掠杀戮是行军的

¹¹ 王舜：《恭陈末议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26，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¹² 王文奎：《荐举人才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68，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¹³ 胡贡明：《陈言图报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11~12，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¹⁴ 胡贡明：《陈言图报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11，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¹⁵ 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1，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¹⁶ 张弘谟、张存仁等：《请乘时进取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3，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¹⁷ 胡贡明：《谨陈事宜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27，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传统内容，文士对此十分反感厌恶。王文奎说：“夫出兵无名，事故不成”，而八旗“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与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哉？”¹⁸胡贡明说：“人心即天心，人心之归，即天心之与”，“今我皇上凡有出兵，房屋烧毁，土地荒芜，如此行事如何使人归心，而上天乐助与乎”¹⁹？丁文盛等建议：“臣愿汗广开仁慈，大就王业，得一城安一城，人民、妻子、衣服、财物丝毫不动。”²⁰马登云建议：“大兵行后，途间不可妄杀行路之人”，“凡兵马歇息处所，不拘村屯城堡，可先传令，不许妄杀人民，抢民财物。临行之时，粮草房屋不许烧毁”²¹。马光远言：“凡成大事者，不贪小利。请皇上于出兵之日，戒谕将士：无杀良民，无淫妇女，无掳货财，无焚屋舍。”如不此之图，“臣窃以为失算也”²²。

反对八旗旗主的平分秋色，改变八家平分战利的一贯传统，胡贡明说：“我国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若有得来，必同八家平分之，得些人来，必八家平养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²³此建议引起共鸣，马国柱上奏称：“乞汗速将胡贡明所议之例，无论新旧人一体实施可也。”并指出或者有人说八家养人是先汗旧例，行之已久，难以骤更，独不思此旧例乃“僨事之规，岂可沿袭”²⁴？

还有针对具体问题者。宁完我指出：叛明来归的孔有德、耿仲明一伙官兵，乃“暴戾无才”的“无形影之人”，主张对其要“酌量善御”，不可“益恣凶徒无忌之心”²⁵。

上述针对现实问题的诸多言论，不论可以立即实行者或难以实行者，皆记录在案。这一切展示了旗人开阔的思想及求实的精神面貌，为中国思想文化宝库留

¹⁸ 王文奎：《条陈时事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16，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¹⁹ 胡贡明：《谨陈事宜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29，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²⁰ 丁文盛、刘福星：《谨陈愚见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44，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²¹ 马登云：《条陈进征事宜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73，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²² 马光远：《请施仁布义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85，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²³ 胡贡明：《陈言图报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10，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²⁴ 马国柱：《请更养人旧例及设言官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43，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²⁵ 宁完我：《陈孔耿官兵请酌量善御奏》，《天聪朝臣工奏议》页60，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

下了珍贵财富，意义非凡。

二

皇太极时期所形成的议论风发的文化传统，至清兵入关——这一夺取全国政权极为关键时刻，光大发扬，促使一切智能之士因时而进，终于产生文化促进政治的积极社会效应。而皇太极时期诸多文士曾一再强烈要求停止而难以停止、难以解决的八旗肆行抢掠屠戮，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此刻由于文士的及时建言，竟迎刃而解。其中镶黄旗汉军人范文程可谓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深思熟虑后认准时机而发的一篇进言，创造了奇迹。

生员出身的沈阳人范文程，当天命三年努尔哈赤率兵攻下抚顺时，被虏获，隶镶红旗下为奴，从此跟随主子奔波于战场，历尽苦楚。天聪三年，在皇太极下令对八旗下所有孑遗充当奴隶的诸生加以考试后，乃脱离奴籍，被拔置文馆。初为一般办事人员，后因敏捷有为，而逐渐升迁，至崇德改元时，任内秘书院大学士，晋二等甲喇章京世职，被尊称范章京而不呼其名，已位居文臣之首，深受皇太极赏识。他同众文士一样多有建言。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在诸多文士发表言辞激烈的见解，强烈反对八旗抢掠屠戮行径，要求立即停止时，却不见他的声音。显见他洞察形势，深谋远虑，谨言慎行，认定现实尚难以做到的事情绝不贸然发声，采取于事无补的动作。他是在等待时机，在静观时局之变化。他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这就是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已改隶镶黄旗的他觉察到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已经扑面而来，于是毫不迟疑地发挥了天聪年间文士建言的优良传统，立即以最为明快的语言建言献策，展示了他的大智大勇，更把旗人聪明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与时俱进的光辉之文《进取中原论》（原文无题，此为笔者所拟）的出现，意义极大。虽然该篇全文不足六百字，但却字字千钧，力透纸背，其博大精深，气吞万里的豪迈气概，是开创清朝新一代的纲领，成为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雄文，足可雄视百代，传诵千秋。其文是：

乃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兵燹

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顾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皇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祇承先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貽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蠹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此，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²⁶

该文是范文程于顺治元年四月初提出。这是他以睿智的头脑深刻而精准地分析形势后，阐述的明确主张。此时，明朝已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所推翻，虽然明朝覆灭的消息尚未传至辽沈，范文程对此尚一无所知。然而，他从陆续传来的各种情报中分析判断，早已预感形势严重，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故在其文中明确指出：此时天下动荡至极，明朝四面受敌，形势严峻，统治岌岌可危，已成瓦解之势，难以为继。而饱受苦难的中原百姓急切希望社会安定，寻求有作为的好皇帝，以

²⁶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辛酉。按，范文程生平“善属文”，而担任要职之后，建言奏议极多，“帷幄赞画，皆国是大计，外庭莫闻”。然而严酷的事实却是他的诸多奏议，竟皆“自焚其草，故罕传于世”（李果：《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传》）。实录所载此篇可谓难得的保留，虽属节录之文，但其精神要旨皆灿然俱在，弥足珍贵。

求安居乐业，已是时代的大趋势。即所谓“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随而点明在这种形势面前，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大好机会。机会难得，稍纵即逝，必须抓住。他严肃指出：“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貽悔将来者亦此时。”即这是极为关键的时刻：既是抓住机会可以成就大业，造福万代之时；也是错失机会而貽误将来，追悔莫及之时。更明确指出：“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最清楚不过地指明当前斗争的根本方向与任务，即表面上与明朝作对，但明朝已不可救药，实际上乃与农民军争夺天下，农民军已是我之劲敌。而夺得天下的关键在于赢得人心，为实现赢得人心的目标，所以必须于出兵之际“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即严令全军绝对不可抢掠。且“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并昭告远近，实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之政策。如此，广大官民必望风归顺，“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此文高屋建瓴，围绕得失人心问题，大做文章，为出师制胜夺取天下，描绘了可行的蓝图：必须抓住时机，抓住时机的关键是赢得人心，赢得人心的关键是“秋毫无犯”，即停止一贯的抢掠行径，唯如此方能夺得并稳坐天下而造福万代。否则照旧抢掠，那是白忙乎一气，把百姓通通推到农民军一边，坐失大好时机，得眼前之财物而丢失天下，将追悔莫及。这高屋建瓴，发人深省，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分析得头头是道，可谓一针见血，有极强的说服力。此文再次提起天聪朝诸多文士一再提及停止抢掠的问题，这一当时难以实现的问题，此刻因时迁势异，已完全具备了可行的条件。那就是入主中原，夺得天下，主宰天下，一切曾经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国家经济来源，军资军饷，乃至十分棘手的八旗生计问题，便都可迎刃而解。摄政王多尔袞等被此议深深打动，完全接受，乃把握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立发大军“往定中原”。同时，降将洪承畴，亦奉咨建议打出“灭贼”的旗号。多尔袞遂下令坚决停止抢掠，以仁义之师的面貌出现。范文程的《进取中原论》，促使清廷做出了放弃抢掠的决定，一篇文章真有雷霆万钧之力：改变了传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此文竟成为清兵入关之指导性文件，实是盛京文化登峰造极的光辉杰作，是宽松政治文化环境下促成的，亦是清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首屈一指的鸿文。是与时俱进、最切合实际、最有的放矢的清开国纲领。堪称中国历史名篇，足与贾谊《过秦论》、诸葛亮《出师表》相媲美，

而更富现实意义。

三

1644年清廷决策大举挥兵入关，占领北京，继而挥兵南下，转战各地，结束了仅据关外一隅的局面，终于君临九州。夺得全国统治权的清朝，为巩固其统治乃于重要战略要地分兵驻防，掌控全国。这时八旗将士及其家属几乎悉数入关，并分布全国各地。清朝的一统天下，是旗人无限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的结果，继而旗人又开始了新的历程，展示了非凡：不仅八旗武功赫赫，其雄师神威所致使清朝由马上得天下，而在治理天下中旗人更以文治成就新人耳目。

旗人夺得天下、掌控天下，最突出的特点是与时俱进，思想适应形势，将盛京文化开放、务实、积极进取及吸纳融合，而独领风骚的精神展现到极致，其文化上的建树辉煌惊世。

其中，最有震撼意义的是旗人最高统治层，爱新觉罗家族的非凡表现，尤应特别提及的是最高统治者清前期几位皇帝的巨大贡献，他们极为开阔的思想，伟大的进取精神，及善于学习而巧妙治理国家的表现。夺取全国政权不易，治理国家更难，然而善于学习、善于因时而动的传统，使他们一直走在时代前列。首先，他们赓续皇太极开始的积极借鉴明朝的统治术，“一切照大明会典行”的治国方针，一切按明朝的典章制度行事。诸如实行内阁制，地亩钱粮按万历会计录原额征收，刑律按大明律行事等等。很快国家治理有条不紊，偌大的国家立即平稳安定。当然，这仅是初起的必要步骤，紧随其后的便是模仿后的创新，制定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典章制度，诸如编制大清律、大清会典，编纂赋役全书，以及颁布各种则例等等，完成完善了新政权独具特色统治体系，有效地掌控了全国。此可谓高超、高明的统治艺术。然而这种统治艺术的获得则是全然获益于皇太极以来形成的开放务实传统，爱新觉罗氏最高统治者，最为远见卓识之处在于，他们绝不拘泥固执，而是充分信任并放手发动臣下，令其敞开心扉建言献策，对切实可行者，便敏锐辨识而悉加采纳。

人们看到顺治初年，在旗人范文程积极建言的带动下，诸多汉臣建言献策的踊跃景象。而清当权者，正是据以听取、采纳，而制定相应得宜的治国方针与政策。使清朝君临全国后，便以十分有效的手段掌控了全局。这是开创精神与非凡的智慧巧妙结合的辉煌硕果。其中，正白旗人摄政王多尔衮，从谏如流，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大智大勇，当机立断，统众入关，开创了一统规模。他虽非皇帝，却起到了最杰出的开国帝王的作用。他的五世侄孙乾隆帝弘历曾评价说：“睿亲王多尔衮当开国时，首先统众入关，扫荡贼氛，肃清官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²⁷从多尔衮身上展示了旗人最不寻常的精神面貌。

多尔衮之后，以少年亲政的顺治帝福临则以惊人毅力成为旗人中学习创新的典范，他为有效地掌控天下，治理国家，极力刻苦向学，不仅顺利突破满汉语言障碍，且很快掌握了汉文典籍，得其精髓并运用自如，更多有创新。其中，他深感施行教化，开导民智之重要。从顺治十二年起，即颁诏陆续编纂大书并亲自作序。所敕编之书有：《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人臣儆心录》《通鉴全书》《孝经衍义》等。又下诏开馆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编辑《太祖圣训》《太宗圣训》。无不是以儒家思想，进行教化。从而开创清代御制编书的先河。他平生兼通满汉文字，博览群书，多才多艺。通文章、喜诗词、擅绘画、精书法。著作有《圣母皇太后万寿诗》《孝献皇后行状》及后人辑录本《世祖章皇帝圣训》等行世。虽然他英年早逝，却给后世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

自顺治帝福临之后的清朝历代皇帝，在治国理政的文治武功方面有杰出业绩的同时，个人的文化修养甚高并成就斐然，他们几乎都是文章高手、著作大家，不仅皆有《圣训》刊刻出版，更皆有文集行世，如康熙帝玄烨有《御制文集》四集，即初集40卷、二集50卷、三集50卷、四集36卷；雍正帝胤禛有《御制文集》30卷，以及《悦心集》5卷、《大义觉迷录》4卷，乃至《朱批谕旨》360卷；乾隆帝弘历有《御制文集》四集，即初集30卷、二集44卷、三集16卷、余集2卷，还有《乐善堂全集》30卷、《日知荟说》4卷、《评鉴闡要》12卷，等等。每位

²⁷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四八，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辛未。

皇帝皆有诗作，其中，仅乾隆帝弘历所写就之诗篇即达43000余首（按《全唐诗》所收2200余诗人之诗作总共48000余首），创下了中国历代诗人之最。这是历朝历代无可比拟的奇迹，更展示了旗人的伟大创造力，展示了盛京文化对中华文化总体的伟大贡献。

上述诸位清帝的所有著作，绝非无聊应景文字游戏，而多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其中多有闪烁思想光芒的精辟之论。

玄烨的文化建树极为突出，他是位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的文化多面手，对社会与自然的各种问题皆有研究，皆有成就。不仅是文史大家，更是科学通才。其御制文集中，内容极为丰富，可谓包罗万象。此外他还编辑，实际是总纂或主编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大书。诸如哲理方面的《御纂朱子全书》《御定孝经衍义》，天文历法方面的《历象考成》，乐理方面的《律吕正义》，数学方面的《数理精蕴》等等，他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文化巨人。他思路缜密，多有灼见，颇有启发意义。诸如他主张坚持儒学求实之原则，不赞同所谓反经以及怪诞、祥瑞之说：“古人有言反经合道谓之权，先儒已有论其非者。天下只有一经常不易之理，权衡轻重，随时斟酌而不失乎经常之理，此即所谓权也。岂有反经而可以行权者乎？古称庆都感赤龙之祥孕十有四月生尧，此等事先儒常疑之。正如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谓也。盖圣人不语怪以垂戒于世，而后人犹有矫诬上天，侈言祥瑞之事，况敢从而启之乎！”²⁸

胤禛明确提出不分华夷的思想。他说：“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说：“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乂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又进一步论述道：“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

²⁸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六，《讲筵绪论》。

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²⁹他不讳言满洲所处夷狄之地，理直气壮地公开宣布华夷一家，思想尖锐认识深刻，具有强烈的论辩力、说服力。展示了国家一统、内外一家的正确政治主张，十分坦率、新颖与难得。

弘历以大无畏的气魄，正视历史，处理历史遗案的态度与精神，令人眼睛一亮。他对清初以来曾被判定为“谋逆”的摄政王多尔衮，大不以为然，进行了平情准理的评价。其《命追复睿亲王封爵谕》长达2000余字，据理阐述，指出多尔衮不仅非为叛逆，而是在为清朝开创一统大业中，功劳最著，是大忠大义之人，恢复了历史本来面貌。其文层层推进，辞清意明，思路缜密，结构谨严，实属难得之佳构。其判定明清之际的历史问题，犹有振聋发聩之见。乾隆四十年他下令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这是惊人之举，因为将在该书中收录的是明末清初在抗清斗争中不屈死难者，即明朝殉节诸臣，这是给清朝的敌对者立传。其目的是表彰忠节。他在上谕内阁中，回顾历史说：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然自古以来改朝换代时，凡战败之国死事诸臣，新出之朝廷罕有给以谥号者。只有我世祖章皇帝当定鼎之初，对崇祯末年殉难之大学士范景文等20人特恩赐谥。这是“圣度如天，轸恤遗忠”，实为亘古之旷典。但当时征询不广，仅据传闻，未遐遍为搜访，表彰人数有限。而今“遗事渐彰”，可经论定成书。他特别指出：“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谏诤，抵触佞王，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与夫俘擒骈戮，视死如归者”，当时我王师前往讨伐，自不得不申法令，加以诛戮，以辨明顺逆。但“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即自尽以全名节，其心亦并可矜怜”。而对那些没有官职的诸生平民及不知姓名之流，“并能慷慨轻生者”，这些能为国抒忠之人应予优奖，议谥，

²⁹ 胤禛：《大义觉迷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史资料》第四集，页3~5，中华书局，1984年。